



英雄挥戈驱虎豹

——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

■钱宗阳

1943年9月,51岁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接到纽约电台的邀请,参加一档节目录制,介绍她的新作——《中国的战歌》。

“他们没有吃,没有穿,没有枪和炮,但是可以从敌人手里收缴……”书中,史沫特莱用细腻生动的笔触,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。

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却向死而生的抗争。中国军民以巨大牺牲,迎来了战争的转折点。就在《中国的战歌》在美国热销之际,史沫特莱采访过的八路军、新四军,从青纱帐、芦苇荡中悄然出击,扑向周围的日伪军据点。

从1943年夏秋开始,“四万万人齐蹈厉”的中国战场,局势发生逆转: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开始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。光复河山的“中国战歌”,响彻神州大地,一扫百年沉沦。

胜利的曙光近了!

1943年夏季,多雨泥泞的库尔斯克草原上,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撞碎了法西斯的迷梦,由此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大规模进攻。

笼罩在人类头顶的法西斯阴霾开始消散:从美丽的西西里岛,到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,盟军的反攻锐不可当。

东方主战场上,敌我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有人做过一组统计:侵华日军平均身高从1938年的1米66,降至1943年的1米46;平均体重由1938年的56公斤,降至1943年的47公斤。因为兵源不足,日军甚至征召传染病患者、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入伍。

东方欲晓。此时,华北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神出鬼没又无处不在的敌后抗日武装,让日军疲于应付。从1943年夏秋之交起,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,逐渐失去了战场主动权。

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日记中坦言:“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,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。”一个日军师团长上任不久,就发现日军“虽占点与线,但处处薄弱,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,情况十分严重”。

犹如桅杆上的瞭望者,毛泽东同志自信断言:“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,现在无论如何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。”

然而,此时的正面战场却是另一番情景。1943年,国民党军队非但没有对日军发起过主动进攻,竟然还出现可耻的投敌潮。

面对日军进攻,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鹿炳勋躲进山洞,却因耐不住鸦片烟瘾,让副官外出购买烟土,导致行踪暴露。被俘后,他很快投敌,调转枪口同八路军作战。

1943年7月30日21时,卫河南岸,3发红色信号弹连续升空。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对侵占卫河以南地区的伪军鹿炳勋部,发起凌厉攻势,歼灭伪军5600余人,收复了卫河以南地区。

卫河,古称白沟。出太行山,卫河河道急转流向东北方,在中原大地画出大大的“V”字。

8月18日,八路军第129师决心乘胜出击,发起林(县)南战役,消灭盘踞在太行山南部地区的鹿炳勋、孙殿英部主力。此役,八路军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,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。

卫南、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讨伐伪军的战役,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,是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经积蓄力量、发展壮大后准备反攻的必然结果。

困兽犹斗的侵华日军,将冀西、冀东、太行山区等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,妄图通过残酷“扫荡”巩固占领区。

1943年10月24日清晨,临屯公路尘土飞扬。



铁血军魂(油画)

高 阳作

一支插着“太阳旗”的日军车队,大摇大摆向着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开进。

这支队伍,成员是日军从华北各地抽调的旅团长、联队长等军官。此行,他们的目的是“战地参观”,学习冈村宁次新的“扫荡”战法。

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,刚刚被过筛子般“扫荡”过的山川深处,埋伏着八路军一个主力团。

霎时间,公路上枪声、爆炸声、喊杀声不绝于耳。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聂近山指挥部队猛扑、猛打、猛冲,仅1个多小时,就歼灭日军“战地观战团”120多人。

当冈村宁次派出战机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时,日军飞行员只看到车辆的残骸和秋风卷起的黄尘……

二

江苏淮安,千年古镇车桥,车水马龙,人流熙攘,宽阔的高速公路和繁忙的新长铁路纵横而过。

作为江淮腹地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,80多年前这里曾被侵华日军重兵占据。

1943年秋天,一支精干的新四军小分队,从当时碉堡林立的区域隐秘经过,秘密侦察日军布防。

时任新四军第1师侦察科副科长的严振衡晚年回忆,带队侦察的正是师长粟裕,赴新四军军部开会后,他特意舍近求远,绕道从车桥一带返回苏中。

1944年春天,车桥镇的柳树刚刚长出新芽,第1师兼苏中军区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,发起了车桥战役。

这一战,成为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起点。新四军歼灭日伪军900多人,活捉日军24人,顺利收复车桥,打通苏中与苏北、淮南、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。

车桥战役一个月后,抗日战场风云突变。日军越过黄泛区,开始了一场纵贯中国大陆南北的大规模进攻。日军大本营将这场战役称为“一号作战”。

这时的日本,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惨败,已成强弩之末,却在中国战场又发动攻势。

让人瞠目结舌的是,长期接受盟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,短短几个月就接连丢失郑州、洛阳、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、南宁等重镇。至1945年1月,

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,摧毁沿线中美空军基地。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

惊涛拍岸。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挽狂澜于既倒。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:“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。”

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截然不同,在鲁中、鲁南、滨海、渤海和胶东等广大的敌后地区,八路军向日伪军展开反攻,威逼济南、青岛、徐州等大城市,切断津浦、胶济、陇海铁路交通。

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,一度攻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,仅1944年就歼灭日伪军4.5万余人。在晋冀鲁豫边区,八路军先后收复10余座县城,解放人口500余万。

国民党军丢失的河南广大地区,更是出现了奇特一幕:1944年9月至11月,以八路军太行、太岳军区及驻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的4个支队,先后渡过黄河,挺进豫西,开展游击战争。日军在前面追着国民党军队打,八路军则在日军身后迅速反攻,把国民党丧失的大片国土变成红旗飘扬的抗日根据地。

1944年9月,中共中央决定由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,分批南下,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,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,造成南方一翼。

从陕北到广东,山水迢迢。这是一次横跨敌后数省的艰难进军,也是一次完全无后方依托的千里跃进,途中艰险不言而喻。

队伍出发前,诗人李木庵挥笔写下《南征曲》,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。那年,李木庵已经60岁。送子远征的目光里,写满了烽火家国、山高水长。

“展图奋程八千里,日指潇湘七泽水。”路,靠“铁脚板”一步步闯出来。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,转战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7省,经历大小战斗130多次,一直打到广东南雄、始兴县境。地图上,一个锐利的红色箭头,把华北、华中、华南连在了一起。

三

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,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

自力更生的中国共产党,究竟为何能赢得胜利?带着疑问,爱泼斯坦和另外两位外国记者从延安出发,穿越重重封锁前往晋西北抗战前线。

“这次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访问敌人后方的‘第二战场’。”爱泼斯坦写道。

在距离日军重兵驻守的汾阳仅几公里的村庄,爱泼斯坦“目睹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3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,烧毁了火车站、机场、房屋、电站和一家火柴厂”,而“守敌始终龟缩不出”。

黑暗中的熊熊火光,令爱泼斯坦感慨不已:“抗日根据地已经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。”

1944年7月,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赴冀中地区考察,近距离观察抗日根据地军民组织的游击战、地道战。随行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:八路军拔掉日军的炮楼,抓住了一个日本士兵,又抓住了一个日本士兵。杜伦由衷赞叹:“能以如此巧妙的方法坚韧地同日本人作战的军民,必将取得胜利!”

胜利,如一面明镜,可以照见一支队伍的底色。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掀起局部反攻的时候,郭沫若撰写的文章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。

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,都是吃了亏的。”为什么要重温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?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,毛泽东说:“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

清醒而自律,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。1944年7月1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《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》。人民军队在紧张的战斗间隙,开始了又一次集中整顿,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蓄积磅礴力量。

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,轰轰烈烈的整训锻造了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。到1945年夏,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。

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,来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。5月8日,德国无条件投降;6月底,美军攻克冲绳岛,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。

在中国战场,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局部反攻,日军被迫困守在大中城市、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。

转折关头,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700多名代表齐聚延安,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提出,放手发动群众,壮大人民力量,在我党的领导下,打败日本侵略者,解放全国人民,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。

党的七大闭幕后不到一周,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。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共同参加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。毛泽东说,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,我们一定能胜利!

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,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!”……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了。

学术支持:褚 银
版式设计:方 汉、杨 磊、贾国梁

